

在2025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特别推出“广州水系变迁与城市发展研究”专题。今年博物馆日以“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为主题。社会需求不断演变，我们应与时代共振。广州依水而生，因水而

兴，从秦汉初创到明清繁荣，再到近现代转型，广州城的水脉见证了城市的深刻变革。城中的遗址和博物馆作为历史的守护者，不仅保存了广州水城的记忆，更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智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于近日发布

《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强调“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提出“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本专题通过梳理广州水系的历史脉络，亦呼应政策精神，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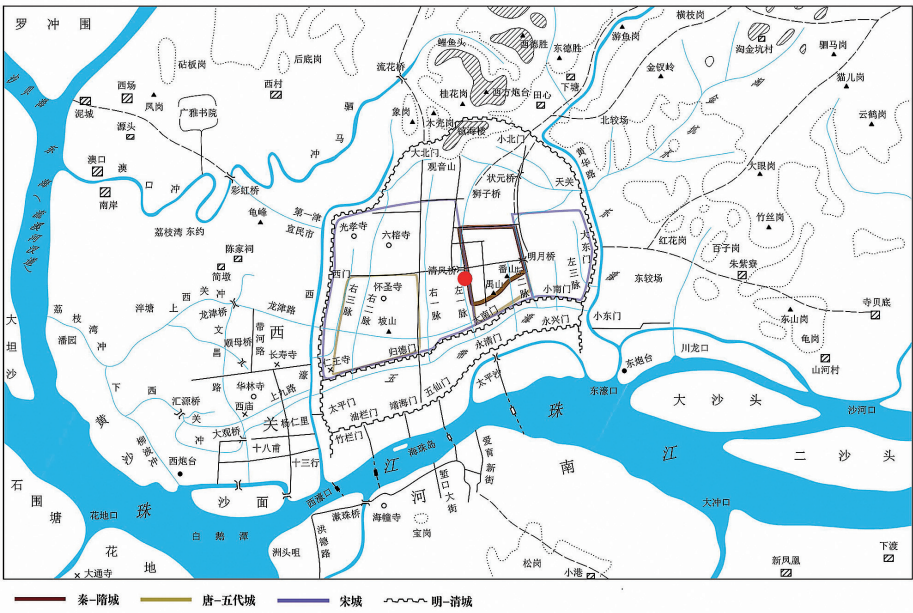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珠江奔涌泽千年，羊城因水绘宏篇。  
广州城的“水”，于秦汉时守护城垣，奠定根基；自唐宋间疏通脉络、铸就繁华；于明清之际融入治水理念，至当代，更与都市新韵交相辉映。它不仅勾勒出城市地理的雏形，更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命脉。从最初的依赖自然水系，到因势利导控制水系，直至如今追求人水和谐共生，从“人”与“水”的数千年携手历程，我们得以见证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并深远城市治理的智慧演进及治水理念的代际传承。

本文通过梳理广州水系在古城建设、发展中的历史脉络，试图勾勒“人”与“水”互动的广大而精微画卷。这画卷不仅留存于浩瀚文献与考古遗址之中，也在城间众多博物馆展厅中栩栩如生再现——漫步馆内，可一览千年风云；步出馆外，亦仿佛进入宏大露天博物馆，众多街巷和建筑皆蕴藏故事，注释着城与水共生的不绝篇章。



位于广州光明广场负一层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新快报记者 郭思杰 摄



广州城区变迁示意图。图中红点部分为广州小北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所在位置

壹

依水而生：先秦至唐代的依存顺应

广州古城与水关系密切，其选址并非偶然，而是在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顺应珠三角水系环境而成。广州城依水而生，因水而兴，与云山珠水大格局下的水文江海休戚与共。

6000年前，今广州珠江以北地域大多被海水环绕，现海珠区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发现的海蚀崖和海蚀平台即是6000年前广州古海岸存在于此的重要实证。古时坡山、番禺等高地原是小岛，后因白云山洪夹带泥沙淤积，小岛渐与陆地相连，形成半岛。秦汉以前，广州珠江北海岸线的地形，大致由一个大湖（兰湖）、两个半岛（城山半岛、番禺禺山半岛）、三个海湾（浮丘湾、海珠湾、海印湾）组成，此后逐渐淤积融合，最终为广州城的兴起奠定地理基石。

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平定岭南后，在珠江畔、甘溪水道旁，筑任嚣城。此后赵佗以该城为核心扩建番禺城，仍以天然江河溪流构建城防。至唐代，广州虽发展为水网密布的大城，仍多利用原水系布局，较少有人工河渠，体现着广州先民顺应自然的营造智慧。这种“依水而生”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广州在两千余年岁月中，始终与云山珠水共生共荣。

任嚣病危之时，召见赵佗谓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观尉佗旧治处”，感叹“斯诚膏腴之地，宜为郡邑”。他们为何都选择了当时的番禺？水，无疑是关键因素。番禺城北据越秀山，南临珠江，东西两侧分别有甘溪东支和西支流过，成为天然屏障，又便利水上交通，成就“金城环抱”格局。这是其被选中的核心所在。

上文所述“兰湖”，又称芝兰湖，曾处广州古城西北象岗山下，今双井街、流花湖一带，是水流自然堤后洼地积水而成。湖西面通过驷马涌（唐代称船澳）与珠江相接，可往西江、北江及内陆，为唐宋时船舶避风港。南朝《南越志》有称：“番禺北有芝兰湖，并注南海。”所述“甘溪”则发源于白云山东麓蒲涧滴水岩，至越秀山麓分东、西两支绕城向南，西支经今华宁里和教育路一带，南流入珠江；东支沿今仓边路南下长塘街，注入清水濠出珠江。自汉至唐代，甘溪一直是广州城内居民的重要饮用水源。

城者，盛民也；池者，护城河也。日前



2002年在越秀区中山四路以南、大塘街以东清理出一段河堤遗迹，大致呈西北-东南向，推测为宋代清水濠堤岸

于南汉二陵博物馆最新开幕的“寻迹羊城2024——广州古城考古新发现”展览中，我们可从“小北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相关的展示和讲述中，一窥秦汉至唐广州城址稳定的地理原因：

广州古城北倚越秀山为屏，南临珠江设水闸控制潮洪，东西两侧受甘溪古河道东西二支自然切割——负山襟海、两水夹持的格局，城市空间被“锁定”在了由番禺山禺山高地所形成的天然半岛内（周长约2800米，范围大致在今日仓巷—大塘街以西、华宁里—流水井以东、西湖路以北、越华路以南，面积约0.4平方公里），官署核心区则踞守高地。在这里，甘溪河道既成为护卫都城的天然屏障，客观上亦充当了制约城市扩张的地理壁垒。

在这方区域，南越先民以水为脉，以智慧为梭，曾织就于千不朽水利传奇——位于南越国都城西南隅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与南越国官署遗址里的曲流石渠等，都诠释着时人“因天材，就地利”的治水哲学。

为防海潮、排洪涝、引江水，人们建起这座水闸，历经沧海，至今仍有部分留存。在建闸过程中，先民对材料的选择、松软地基的处理、水闸结构的布置、泄流处理、闸室稳定等进行了精心规划设计，考古发现表明，诸多细节竟暗合现代《水闸设计规范》标准，堪称古代防洪排涝工程之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南越国木构水闸的修建，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对水的控制，但总体上仍属于在自然条件基础上的利用，它利用珠江的自然潮汐规律，通过简单的水构筑物实现防洪、排涝和引水的功能，体现的是当时人类对自然水文条件的顺应利用。

在距水闸遗址东北方向约800米处的南越国官署遗址内，则可见目前秦汉城市考古发现中保存较完好的排水设施及人工园林水景，并窥见王家园林水文策略。在南越国官署遗址中不仅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明沟暗渠，可以形成纵横交错的地表地下排水系统，将地表雨水、生活污水迅速排地势低洼处，引向官苑外；还发现了曲流石渠官苑水景遗迹，从东北蜿蜒向西，并筑有急弯处、弯月池、渠陂、斜口、水闸等人造景观。

以上两处遗址，见证着广州秦汉先民如何将潮汐江河化作古城“血脉”，用木石之躯顺应壮阔波澜。

今天，当我们来到北京路商圈核心区的光明广场，进入其负一层，来到始于两千年前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透过展厅玻璃幕墙，可见部分闸门犹存，榫卯接口清晰，多根巨大的水松枕木或立或躺，让人不由想象从前脚下曾有江水奔腾；自东汉起，随着珠江岸线南移，此处则又叠压起东汉城墙遗址。而在不远处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曲流石渠中的声光电展示，又将岭南园林的源头、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守护者，也是人与水关系的见证。

贰

驭水而兴：南汉至宋的主动营造

驭从“依赖顺应”转向了“主动改造”。

湖心九曜石影动，千年春晓入城来。今天，位于越秀区北京街道流水井社区的药洲遗址（又名九曜国），周边喧闹，园中却静谧，碧水如镜，湖中太湖石或如苍龙昂首，或似灵龟凫水，石间镌刻历代文人墨客题咏，北宋米芾所书“药洲”二字遒劲，笔锋间仿佛可见南汉宫阙烟云。药洲，作为彼时仙湖里的小洲，如今不仅是一座园林博物馆，更凝聚了让历史在场、让文明可感的水城记忆。

如今西湖路这一地名便是源自当年的西湖。明清时期，随着湖面逐渐淤积缩小，湖周边开始形成街市，最终成为今日繁华的商业街。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州城的水系逐渐融入百姓生活，承载城市记忆。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溯至仙湖灵眸初启的五代至宋，那个时期，湖泊的开发与城市景观营造成为彼时重要特征。人们重新疏凿甘溪、兰湖、菊湖，使之可通舟楫，并沿岸建楼阁、饰花木使之成为游览胜地。城内修筑水关、池苑、明暗渠等，构成南汉都城兴王府的给排水系统。其实，湖泊的开发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景观价值，还为城市的水利调节、航运和旅游休闲提供了重要资源，使得广州在南汉时期就已经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经济繁荣的水城。

1994年，在德政中路和担杆巷交界处发现的一座南汉水关遗址，为一段南北向、长条形砖砌券顶的涵洞。入水口在北，出水口在南，呈八字形。出入水口两头都有木柱和厚板构成的接引段。这座水关，既可以引水入城，又可以防止洪水和潮汐冲击导致的水患。

而从宋代开始，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广州的水利建设也再次掀开历史性的新页——

北宋始建“三城”，在唐五代广州城的东、西面增筑城池，形成了子城、东城、西城三城并列的格局。在筑城过程中，众多水利工程随之开展，如开凿西濠，修筑南濠（西澳）、清水濠（东澳、古东濠），凿玉带濠（明代濠名），城内筑六脉渠，汇集城北水流，经城区汇流到城濠，再注入珠江，构成“河渠—内濠—江海”的水系。

2002年，考古人员在越秀区中山四路以南、大塘街以东清理出一段河堤遗迹，该河堤遗迹大致呈西北—东南向，根据文献推知为宋代清水濠（北宋的东濠，东濠北段称文溪，为甘溪东支）。河堤始筑于北宋早期，废弃于南宋晚期或元代。2007年和2008年，在越秀区长塘街以东、大塘街以西分别发现唐末五代和宋代河堤，大致为南北向，应为古东濠西堤。

“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说的是古代广州城依地形地势修筑而成的六条南北向渠道，称为六脉渠，主要用于广

叁

与水共生：文明跃迁与文化遗产保护

南岸发展，逐渐形成街市商业区。漱珠涌位于海珠区西北角，南临马涌，北连珠江，涌口正对十三行，西侧是宽阔的白鹅潭，为当时广州主要的港汊。

2012年，2022年，考古人员在越秀区盘福路先后发现了明代和清代埠头遗址，位于明清广州城西北段城墙以外，说明在古老的广州，码头延伸到今天盘福路附近一带。2013年在珠光路以南、文德路以西工地发掘的一段明代红砂岩河堤遗址，应与明代珠江北岸有关。同年在长堤大马路清理出大量清代晚期瓷片堆积，推测此处有晚清有专供陶瓷器运输的码头。2014年，在北京南路发现3艘清晚期木船，说明北京南路一带至少在清代晚期仍然是珠江岸边，属江边滩涂地带，此后随着城市扩展，珠江岸线不断南移至今天字码头所在。2022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现的明清城壕护堤遗址，东西向，为明清广州城西部的护城河，北面可能接兰湖，南通西濠。

近现代以来，广州经历了多次水患灾害，这促使城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了水系治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东濠涌的治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宋代开始，东濠涌就是广州重要的城市水系之一，但到了民国时期，东濠涌环境日下，境况堪忧，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自2009年开始，东濠涌经过系列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提升了水体自净能力，重塑了水下生态系统，实现了水质逐级提升。

今天，当我们走进东濠涌博物馆，这个国内首个城市水专题博物馆，能读到“涅槃重生”的种种岁月步履；而走出馆外，进入成为“万里碧道”组成部分的河涌沿岸，看到的是“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岭南水乡新画卷。眼前，黄发垂髫嬉戏岸边；上方，高架桥上车水马龙，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

广州城的排水，也能让船只入城。五代南汉时已有六脉渠的前身，宋代开凿修建完善始成。

宋代六脉渠的修建是政府主导的城市水系建设的典范，它不仅解决了城市排水问题，还为城市的扩展和功能分区提供了条件。六脉渠作为城市的主要排水系统，将城北的水流引导至城壕，再汇入珠江，有效地控制了城市内部的水患。明清时期，在唐宋的基础上继续对水系进行疏浚和修缮。对六脉渠的多次修复和对河涌的治理，体现了人类对水系控制的持续努力。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吉祥大厦工地发掘出一段长9米的宋代六脉渠，呈南北走向，两壁用红砂岩和灰白砂岩石条砌筑。渠底用横木支撑两壁的墙基。1996年和1999年，分别在中山五路与越华路同一直线上的南北两个地点，各清理了一段以红砂岩砌筑的石渠。渠壁用红砂岩横、纵层叠结砌，两壁较直。渠底以碎砖瓦、小石头平铺，面上垫一层粗砂。渠内出土大量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中山五路的渠底还发现一袭残缺铠甲。石渠的东壁有一块砌石，上刻“左前卫所”四字。都司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据此可以断定，石渠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明代。从位置上推测这两段石渠为明清六脉渠“左一脉”的一段。

海外贸易与港口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水系的支持。隋唐时期，广州港的发展得益于城内河渠、堤岸、码头等水利工程的兴修完善以及外港的开设。水陆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和交往的繁荣。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港口的繁荣离不开完善的水系支撑。城内河渠和港口的畅通使得广州能够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往来，大量的商品、文化和技术通过水路在此汇聚和交流，推动了广州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发展。

从仙湖苑围到市井脉络，广州的水系变迁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也映射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开放。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广州的水系逐步从皇家园林的专属走向市井百姓的共享，从内陆的涓涓细流融入海洋的广阔怀抱。



小北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现的南汉仙湖湖岸

娱乐、享受自然的绝佳去处，更是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彰显着广州在新时代的蓬勃朝气与无限可能。

如今，像东濠涌这样“涅槃重生”的水系治理成功案例在广州比比皆是。曾经污染严重的猎德涌，现今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流花湖经多年生态保护和修复，成为鸟类栖息地。这些案例彰显了广州在水系治理与生态修复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项任务，强调“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建设连续完整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这一政策导向与广州的实践不谋而合，为城市水系治理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

广州的水系治理，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更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北湖南南，千涌通百川，历史河涌焕新貌，因水而生的生命力和多样性延续着广州水城共生的故事。广州致力于将河涌、湖泊乃至遗址、博物馆打造成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博物馆展览到城市街巷，从考古遗址到现代景观，这里的每一处都在诉说着它与水的故事。

全城的河涌通于濠，通源于江，汇通于海。正如东濠涌博物馆所展示的那样，水的变迁史，也是一部广州人水历史的变迁史，它记录着城市经历的欢乐与痛苦、自豪与期待、光荣与梦想。

上善若水，润城无声。

□王斯宇 程浩

（作者王斯宇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寻迹羊城2024——广州古城考古新发现”策展人，作者程浩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图片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除署名外。）